

柯 灵 主编 萧斌如 洪寿祥 付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 序跋丛书

1919 — 1949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Xuba Congshu

1919 — 1949

海南人民出版社

1919 — 1949

中国现代文学 序跋丛书

小说卷

杨正中 阮文兵

刘莲珍 沈其茜 编

周素菲 黄忠林

海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洪寿祥

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小说卷

(上、下)册

柯 灵 主编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排版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毫米 大1/32 51.5印张 字数 145万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3,000册

标准书号: $\frac{\text{ISBN}7 \cdot 80541 \cdot 075 \cdot 5}{\text{I} \cdot 6}$

定价: (精)20元 (平)15元

《铁轮》序

郭沫若

天虚这部《铁轮》，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默小品”，是一个烧羹弹式的抗议。

近代的好些青年人，真真是有点岂有此理！几几乎什么人都要来“幽默”一下，什么人都要来“小品”一下，把青年人的气概，青年人的雄心，青年人的正义，青年人的努力，通通萎缩了，大家都斜眉吊眼地来倚“少”卖俏！我真是有点怀疑，你们的精神是真正健全的吗？

本来“幽默”是一种性格的表现，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勉强得来，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假装得来的。最高阶级的“幽默”是一种超脱了生死毁誉的潜在精神之自然流露。子路赴卫难，冠缨被人斩断，当然颈子也一定断了半边，他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便结缨而死。淝水之战，谢安石对敌百万之众，寂然不动，弹棋看书。要这些才是真正的“幽默”。现在的“幽默”专贩，那一位有这样的本领？稍稍被人警告得几句，便要脸红筋胀，“狗娘养的”破口大骂起来，不要让“幽默”笑断了气罢。

低级的“幽默”，人人都可以假装出来的，被人误解为滑稽，为俏皮的这种“幽默”，在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每每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它是逃避现实，畏难怕死的一种低级精神之假面。弄得不好，是有送进疯人院的可能的。大抵这种人的社会欲望本来很强，一切虚荣心，利欲心，好胜心，都是不弱于人的，然而遇着了社会的障碍得不到正常的发泄，便自行由外界的现实遮断

起来，封闭于自己的内部。在封闭不甚严密的时候，其被禁压了的欲望，便流而为有意识的“幽默”，那个滑稽的假装行列，有时也会是对于现实的无力的反拨，然而在其本质上不外是对于自己的逃避行为之解嘲，心理学家称之为“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但到这种“幽默”成为了无意识的时候，自我和现实之分裂已经完成，社会也生出了有和他隔离的必要来，便是送进疯人院！

现在的“幽默”家们，尤其年青的“幽默”家们哟！你们要当心，该不是患了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罢？

大凡一种病态成为了社会的流行，那是有它的社会的病根存在的，这种病根一祛除了，病态便自然消灭。现今正有不少的医国医世的大国手在拚命的拔除这种病根，然而患了这种病的人，你们该早早警惕，在未入疯人院之前及早治疗，假使没有本领去拔除社会的病根，至少是拔除自己的心中的病根罢。立在国人的立场上，为救你们自己起见，与其长久地“幽默”，我宁肯劝你们去“发泄”。

不要再假装“幽默”了，不要再苟安于偷懒怕难的“小摆设”了，你们把你们的被禁压了的欲望向积极方面发展罢。譬如天虚的这部《铁轮》，虽然是对于你们的一个无言的抗议，然而也是对于你们的一个对症的药方。你们请把你们的被禁压了的社会欲望向更宏大的分野里去展开，升华而为宏大的硕果。你们的抑郁被扫荡，社会的抑郁也可因而被扫荡，这正是救己救人的大事业。

我这样的叫嚣，怕会是不投你们所好的罢。但请你们不要生气，用力把你们的理智恢复起来，不要成为了感情的奴隶。如你们定要生气，以你们主张“幽默”而破口大骂，你们须要知道那已经是一种病的发作，如不及早回头，你们是很危险的。

疯人也尽可以打医生，然而那个医生会生气呢？

天虚以一个不满二十三岁的青年费了三年的心血，经了几次的打折，写成了这一部五十万字的《铁轮》，这正是我们年青人

的应有的气概，不管他的内容是怎样，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了。

并不是因为作品的大，我便感服，“大”是不容易藏拙的东西，这部《铁轮》正难免有拙稚之嫌。然而在我看来，拙稚却胜于巧老，年青人是应该拙稚的。譬如有一位三岁的童子而谈出三十岁般的老成人的话，我们与其佩服他是“天才”，宁可毫无疑问地断定他是病态，那是早老症，是松果腺的发育受了障碍的。

年青人的朋友们哟，我们来赞美拙稚罢，我们来参加这种精神的膨出运动（Inflation）罢。中国的文艺界应该再来一次“狂飚突进”（Sturm und Drang）把一切朽老的精神病态扫荡得一干二净！！

至于《铁轮》的内容，有《铁轮》自己在，同时我把天虚写给我的一封长信也退还了他，劝他连同他的《铁轮外话》一篇一并发表在我这序后，以节省我介绍的笔墨。不管是赞奖或贬斥，有愿意来品评《铁轮》的人，至少应该把这《铁轮》来回转一遍。

郭沫若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选自《铁轮》 天虚著 东京文艺刊社 1936年12月1日。

《道家的儿女》小引

林语堂

小说也者，无非谈些琐屑家常。所以读者诸君，当你们没有较优良的消遣方法的时候，不妨来一听这些家常琐谈。

这本小说不在辩护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也不象许多晚近中国黑幕小说那样，在暴露它的弱点。它既不在表扬古旧生活的规范，也不在拥护新式的典型。它不过是一桩故事。讲那些当代的男男女女，怎样长大教养起来，怎样学着相依相存的生活过去，怎样的爱与憎，怎样的争辩与宽恕，怎样的忍耐与嫉妒，某种生活习惯和思想方法是怎样构成的，尤其当他们在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上，怎样的图谋适应生活的环境。

选自《道家的女儿》 林语堂著 上海春秋社 1936年1月。

《乡长先生》校后记

王任叔

校完了《乡长先生》，觉得又想说几句话。本来，一个虔诚的艺术学徒，缄默是要紧的。他的主要的工作，是创作的实践。在实践后，接受一切批评家的批评，再来自己下个估量。虽然自己也许有话要说，但他是在改正或保持自己的创作态度中，来作实际的答复的。但我不能那么严正，既然想说，还是坦白地写下几句来吧！

最近跟一个朋友谈起，一篇作品的形成，大抵有三条路子：第一、是亲身体验过的生活的记述。当然，其间也经过删酌，伸缩，添加，插穿，针对一个主题前进，并不是原原本本写下来的。但也因为是亲身体验过的，这作者就很容易在回忆中，唤起当日旧有的感情，跟着感情跑，或把现实歪曲了，或只把握了现实的半面，而误认为整个的趋势。这因为在这畸形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无法使之正确；因而，我们的感情也未必全然可相信。所以在这里，一个作者在利用他体验过的生活之前，应如何把自己头脑冷静下来，将这生活，作为一客观的社会现象，予以分析，整理，并与别的社会现象作个对比，静静的一笔一笔地给它描画下来的客观态度是必要了。虽然跟着回忆，跟着感情写下去，也许这作品的感人的力量较为广泛。日本的某批评家说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岛木健作的《狱》，所以能获得大多数读者，使作品更富通俗性，原因是在作品中有个我可以看见。仿佛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者不同于现实主

义的作者的态度。第二、是观察的路。便是一个作者，为了要发挥他主观的某一种主题，于是去搜集材料，仿佛考据家搜集例证似的，或在现实社会里，或在历史的古籍里搜集材料，这危险是不难明了的。那便是过分的强调了主观。在这里，主观的正确性，既有相余地；而在其表出上，也必然露出所有人物或场面，是被拉到故事里来的痕迹，人物既非典型的活动，场面亦少有机的展开，所谓作品的形象性，将在这里失却了位置。这，我以为，同样是理想主义的作者不同于现实主义的作者的态度。波格达诺夫的《火星》，在艺术价值的估量上，显然是低下的。第三、是什么的路呢，恕我在这里说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但作品的形成是这样的：作者在生活的实践中，从社会现象的底里，把握到它最本质的东西。这东西叫作者在生活中，时时会跟眼前的人物，事件，场面，作个明显的对比，因而引起了憎它，或爱它的正义感，叫作者抑遏不住的不得不拿起来抒写描画。有时，也许作者为了环境的关系有意的把这最本质的东西，放在极不相称的表面的形象里——如把精神胜利的士大夫精神，放在雇农的阿Q身上，用以侧面讽刺辛亥革命，在表面上是非常不相称的。但作者却以极高的艺术手腕，在精神胜利与农民性型的相同点上，将阿Q统一起来了！而士大夫者流绝对可厌，阿Q还有时不免可爱，（至少阿Q那付“蠢大精神”是可爱的）也在那小说分明地反映出来——但一般的作者，总是把这最本质的东西，通过相称的形象，极有力量的表现出来的。这条路，则是现实主义作者不同于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作者的。

不幸，在这里所收的十一篇东西，我都不能照第三条路走。所以很少有深入的东西。举例来说，《还乡》，《一夜》，《逆转》，可说是我一部分的生活的体验，这是无所用其隐讳的。（虽然整个的故事，是自己虚构的。）但在这里，我个人的失败的情绪，通过了作品，成为非常感伤的了。不论这里主题的倾向

如何，但用这样灰色人物去触动读者心灵，总是一桩错误！其次，如《血手》，《友谊》，《仇视》，《灾》，仿佛又是走的第二条路。《血手》那种概念式的表现，这是任何人一读都明白的。《友谊》，《仇视》，《灾》也不过同样要阐明一个主题，这么做的。尤其是《友谊》，我记得做那篇文章的动机，是在看了《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登载的杨振声先生的一篇《仇恨》（？）之后。因为杨先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说明人间的仇恨，能在患难相助上解消。但我觉得世上事情决没有那么单纯。在人与人之间那种结合关系没有合理化之前，要消灭仇恨是困难的。在这里，那种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者所高喊着“爱”，是失其效用了。我为了要表明这社会上的人与人间的本质的仇恨的起因，便利用我的经验，造出二个好朋友——董小二和徐三——如何在某种必然的情形下抛弃了友谊。所以我那篇文章原来也是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后由沈从文先生转《国闻周报》上发表。但用以支持这篇东西的质素，却是我对于那方面较为丰富的经验——本来是想要把它写成一篇长篇的，却给缩压成短篇了的一部分经验。

此外如《牛市》和《追剿》，是我在都市生活中精力剩余时一种对于乡村风习趣味的憧憬与回忆。《乡长先生》，却是继《族长的悲哀》的另一面发展。《春光》发刊的时候，编者写信来要稿，我抓住封建势力的变质——旧的没落，新的却以另一种面目抬起头来——的现象，用族长和村长来个对比，而付同情于能以力量与自然斗争的族长的儿子。可是那文章还没有发表，我回乡一次，我又看到另一面整个乡村的崩溃，在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与准备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情形下，连新的封建势力也无法抬头，却是与帝国主义的先锋买办者稍通脉络的商人身份，反而得利用旧势力，保持他的地位。作乡长的冯文，必须听从绅商的大生，便是乡间某些地方的实际情形。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一个文人的悲

凉语。我知道我写东西的心太急，大都因工作关系，在一个夜里赶成，且又缺少一份艺术手腕，没有把这册里素模的题材，好好给它画出。只粘住现象的发展，没留心个性的深入与刻划。我写下这些话，用以告罪于读者，且求教于批评者。

选自《乡长先生》 王任叔（即巴人）著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6年1月列入《良友文库》。

《说谎者》自序

安 平

这是我的第一册小说集。

我最初是学习写散文的。但是我的年纪太轻，我的感情太浮，这使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葱郁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形惭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

我最初试写小说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在偶然的冲动下写了一篇《春》。第二年（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我又写了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我对于小说发生了兴趣。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这四年中，我断续地学着写，约摸也写了十二三篇小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

二

我写作的产量，薄弱到极点，这大约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的健康不允许我有多量的写作，我平时写了五六百字以后，我便感到疲倦，要是一天我能够写满二千字，这在我简直是一次自幸的收获。我想写一篇小说，常常须先经好几个月内心的酝酿；写成了以后，又需要一阵子很长的休息。

第二，我应该说老实话，我在写作的时候，实在从来没有一次有过一点为稿费而写作的动机过。我以为一个文艺作者，如其是为了要获得一笔稿费而去写作一篇作品，这不是一种艺术的态度，只是一次卖买的行为。所以，当我没有写作的冲动的时候，我就尽让我的砚台在灰尘里放肆，我的笔枝在纸堆里懒散。

三

我自问我自己对于文学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我的作品可以说明我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如何的肤浅和空虚。我内心里常常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矛盾。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摆脱文学，说得再苛刻一点，叫我咒咀文学，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学。这一个冲突，这一个矛盾，就摧毁了我的希望，是在别方面既无造就，在文学方面也一无建树。

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认真真的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我一点简短的口供。这个口供是卑微的，然而诸位先生

请相信我，这一点卑微的口供却是真实的，恳切的。

四

这一个集子里的八篇，是从我在一九三一——三四这四年中仅有的十二篇小说里选出来了的。前后的次序完全以我自己的爱好为标准，这八篇在写作上的前后，则有如下表：

《春》（一九三一年春）

《世纪与义务》（一九三二年春）

《断想》（一九三三年春）

《人世》（一九三三年秋）

《无名》（一九三三年秋）

《乌鸦与马粪》（一九三三年冬）

《原地》（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秋）

《说谎者》（一九三四年冬）

五

最后，我得感谢家璧，这一个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赖他殷勤的鼓励和督促。我又得感谢露西，这几年来她给予我的安慰，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拿来衡量。我现在将这个集子献给她。并纪念我们婚前四年婚后两年——这六年来的不变的爱情。

安平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山西路。

选自《说谎者》 储安平著 上海良友图书
印刷公司 1936年4月 列入《良友文库》。

《独身者》自序

陈翔鹤

回想起于一九二七年代，在北新书局出版了就连自己此刻想起也要觉得汗颜的第一本小说集子《不安定灵魂》以后，距现今不觉又已经有整整八个年头之久了。在这已经虚掷过去了的，一大片茫茫时间中，当掉过头来，自己回看一回看时，自不能不觉得异常的可怕而且可惊。是的，在自己平时，岂不是也曾以“艺术至上”，“工作至上”，等等信念，用来当作鞭策自己生活的惟一目标，和于生之苦斗中，最后的惟一城堡吗？但求其实，当这如许长的一段时间，完全白白的已经滑去了，到现在再认真的来加以结算，才发现了自己，不仅不曾为“艺术”而努力工作过，并且时常的自己无形中几乎将“艺术”当作了一种生活上的附庸，好象它比生活上的任何一种原素都要次要一些。如若不然，那这些年来，恐怕自己就决不会庸人自扰般的，将所有的的时间，精力，全都投掷在如世间所谓的爱情，浪游，职业，事务中，完全的销耗罄尽了。自然，时代所给与我们的艰难和苦辛，在一方面，我们自也是不能加以否认。所以，如果要用如俄国才霍甫之对于契里珂甫，或托尔斯泰之对于布宁，“你有多大岁数了？已经出过几本书？好的，好的，还得多写，大约你的一生还得作××本书。”象那样将著作与生命视决不可斯须分离的一类谈话，一种精神，来范围自己，那自己总是不能不深觉自愧而且内疚的。

不过在这一些年中，自己也曾断断续续的写过有约近二十五万字左右的文章。而在本集内所包含的六个短篇，也即是其中的

一小半部份。从时间上说，要以《早秋》，《大姐及大姐圣经的故事》两篇为早，都同系在一九二九年内写成。因为那时正当杨晦兄在北平编辑《华北日报》副刊，所以自己便不能不写点东西去凑凑热闹。其他的四篇，大都为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两年间，专为我们重新出版《沉钟》半月刊时而写的。而且于此已足见我自己是何等的怠惰，和如果无特殊原因催逼着的话，是很难于提笔的了。但正因其如此，所以举凡自己所写所作的，大都尚能近于“质实”。虽然“质实”并不一定就足以称为文章上的美德，然而，“这里是一个人，一个对于生活上，无论任何一小点喜怒哀乐的情绪都不曾让它卑劣化，鄙吝化，和虚伪化的人，”这一点，或许在读者之间，借着这本集子，是能以吮味得到的吧？

次则关于故事的取材，和文体的使用两方面，在这里，亦似乎可以提述一下：近些年来，用“身边题材”来写小说的事实，好象早就为人们所鄙弃着和讥评着，——以为用个人的私生活作为创作的基调，这种范畴，实在太过于狭隘和褊窄了，不然，即难免不陷入于与“时代”“大众”两相背驰的错误里。但论其实际，则所谓个人者，又何常能超出乎时代范围以外去呢。所以大凡能忠于自己个人私生活的人，便未有不忠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而且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描写，岂不也即是从大众或时代中，去抽出一小片或一小段的雏形来？这种事实，只消一翻开，无论任何人读起来都要觉得感动的，我们邻邦的名作家，如岛崎藤村，志贺直哉，佐藤春夫诸人的作品，便更加可以莫逆于心，不言而喻了。

至于我个人呢，近两三年来，虽也曾想将题材的范围，竭力的向社会方面扩充了去，但因为被“把握不着这种生活的核心，便去驱使这种材料，即无异等于作者的自杀。”这种事实所限制着，所以总不大易于能以成功。不过在写法上，自己总是日加一日的。打算力向冷静，确切，和纯客观的道路上走去的。例如

《洛迦法师》，《家庭》，《独身者》等篇，便是用这种方式描写而成。

“作风即品格”，法郎士似乎是曾经如此的述说过了。自然，这真是有多么的准确啊！而且据我个人想，这更又与古希腊人所谓的“性格即命运一语”是有同样的，几乎更可为称有连带关系的含义的。所以每当自己回头去将自己所有的生活过程，和所有的一小点作品，一返顾起来时，在自己的私心里，总免不掉是要那样的悲哀。因为如现今正流行着的所谓“机智”，“空灵”，“巧思”，等等文学理论和技巧者，这些在自己的文章中，不仅可以说完全没有，反之，则与此正大相背谬的，如“粘滞”，“笨拙”，“执着”，等等毛病，反倒似乎根深蒂固的存乎其间，牢不可拔。自然，如果想要用这种作风去成为一个为世人所爱好的作者，或者是借此可以博得一点世间上的浮名，大约恐怕是很为困难的了。然而“作风即品格”，“性格即命运”，这又有甚么方法可想呢。但只消目标不错，纵然笨拙一点，然拚此一生，打算去遗留下一两篇耐久较为长远一点的小说来，或许总是可能的吧？——虽然从另一方面，再根据着自己生来即具有的“洁癖”，和“粘滞执着”，不大入时的性格，且竟让它去影响到自己作品的本身，在自己偶一回想起来，依旧难免不令人不觉得是有那样的悲哀。

不过，一个人的一生，又何能仅仅只用“悲哀”二字便可以轻轻谢却了呢，因而，到临未来，自己为缅怀前贤所咏叹过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以及“人事日纷，德慧日减，下流之赴，抑又可知！”等等至理名言时，实乃不胜其惴惴和慷慨之情。

一九三六，二，十五。

选自《独身者》 陈翔鹤著 上海中华书局 1937年1月。